

新技术带来挑战，新商科如何应对

■吕波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改变着传统商科教育模式。以会计、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为代表的传统商科，如何应对商业新伦理、新技术、新需求、新实践的挑战，培养适合时代需求的新商科人才，是当前新商科的重要命题。

面对新伦理：突出鲜活

新商科面临新商业带来的严峻挑战。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新商机的同时，也诱发了大量为了获利而不择手段的不和谐事件。比如，有的企业为了达到风险投资者所要求的高增长速率或高市场占有率，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先宰对手、再宰客户，甚至造假、侵权、欺诈、挪用客户押金、失信、失联、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可见，立德树人作为新商科的灵魂所在任重道远。

面对商业新伦理的挑战，新商科要突出鲜活，采用新方式、新方法加强教育，锻造人文精神。在当前新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大量鲜活的典型案例。要把最新案例同步用于教学，讲清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不讲信用、不守规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引导学生不做奸商，要培养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新商业伦理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新商科要与时代同步。要突出价值观教育与法律素养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新商科教学的全过程，向学生讲清合法赚钱、合法经营的重要性，讲清不守规矩、不合法经营虽然可能会带来短暂繁荣，但却埋下了巨大隐患，一旦触发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区块链在信用领域日益得到广泛运用的今天，企业或个人一旦出现不良信用，则迅速产生连锁效应，其后果的严重性是超乎想象的。

面对新技术：颠覆模式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驱动商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演变成复杂生态系统。商业资源从单点、局部、有限、低水平的优化，向多点、全局、无限、高水平优化，体现出智能化的明显特征。物联网的发展推动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带来大量的新岗位，对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新商科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颠覆式改革。新商科可充分利用已有学科的课程资源完成对新技术的教育与学习。设置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学生通过跨学科选修新技术课程。让学生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其它学科中选修所需要的课程。还可以借用人工智能学科课程。2017年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在高校开展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至2019年，已经有344所高校设置了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专业。新商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学科课程帮助学生完成选修。通过跨学科选修通道的设置，在短时期内解决新技术短板问题。

新商科要把颠覆式改革与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要通过引进、培养教师完成新技术教育。比如，市场营销专业的客户画像与精准营销、市场营销大数据建模、市场营销大数据可视化等课程，均需由既懂市场营销又懂大数据的教师去讲授更为适合，而不是由只懂大数据的计算机教师来讲授。新商科在选拔人才时要注意交叉型人才的引进，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引导现有教师学习新技术，更新知识结构，向交叉型、融合型教师转型，引领带动更多商科教师转型成为新商科教师。

面对新需求：四懂一新

在传统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下，社会需要的是懂管理、懂商学的专业人才。但当前社会需求正发生深刻变化。仅懂管理、懂商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新时代需要的是

“懂管理、懂商学、懂新技术、懂新思维”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新思维是指新商业伦理思维、哲学思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思维、交叉思维、美学思维等融合体。以微信版邀请函的制作为例，一份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的邀请函，除了需要掌握新媒体技术如H5技术，还需要通过哲学思维使主题更加突出、在布局上让镜头衬托重点、在制作上有留白、在构图上凸显美学素养等，可见要产出一份让市场认可的产品，需要制作者具有交叉型和综合型思维，具有高雅情趣。

为培养“四懂”人才，要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大数据支持需求的个性化定制阶段。多品种、短交期、批量的特征突出，品种越来越多、交期越来越快、批量越来越小，企业主要通过长尾效应获利。面对社会需要的快速化与多样化，新商科必须以社会服务为载体，增加现场实践、现场实习等学分，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满足新商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为了培养“一新”人才，要重视商业新思维训练。新商科区别于传统商科的本质是，它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知识与概念，而是让学生深入认识新商业的不确定性并能主动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在当前融资环境下，有潜力的

商业模式被视作一种竞争力，属于非固定资产的数据被视作生产新要素，良好的信用与经验被当成一种财富。训练商业新思维能力，就是在面对条件不确定或资产无形化时，让学生能利用商业新思维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财富，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

面对新实践：上对下接

新实践总是优于、快于商科发展。2019年，IBM提出了数字化技术发展正进入基于云架构的智能化运营阶段，即数字化重塑2.0阶段。与快速发展的新实践相比，商科存在滞后效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新实践之所以具有先行性、先进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智能工具的广泛使用，它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人力。传统的机床、专业型设备正在被数控机床、自动化智能设备取代。自动识别、自动分拣、自动吊装、自动收割、AGV小车等智能设备的使用，将节省大量体力劳动。各种研发设计软件以及企业软件使研发、分析更有效率。在新工具、新设计、新软件的作用下，设计更有效率，产品推陈出新的效率也大大提高，导致新实践水平总是领先于商科教育水平。新实践的先行性、先进性，决定了新商科必须要换位思考，实现角色转换，以适应新实践带来的挑战。

新商科要上对下接。新商科要根据市场化原则，主动向上对接新产业实践平台，向下连接新技术平台。新商科不同于传统商科，传统商科仅仅是产业加商科，而新商科是指新产业加商科再加新技术平台，其中新技术平台是指新一代IT技术平台，即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平台。新商科处在承接新老产业、下接技术平台的中间位置，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如果不主动走市场化道路，在上游不主动寻求与产业新平台的对接，在下游不寻求与新技术平台的合作，则新商科的地位可能被边缘化。在寻求上下游合作的过程中，新商科需要得到政府、行业的引导、支持与帮助，确保其人才培养核心地位。

总之，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传统商科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崭新的发展机遇。新商科作为一门将新理论与新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性兼具实用性的学科，要遵循新商业的发展规律，在交叉、融合上寻求突破，即把管理学、应用经济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大数据科学、智能科学等学科交叉，把新技术手段、新商业模式、新物流、新金融等手段融合，上接新老产业，下接新技术平台，以应对商业新伦理、新技术、新需求、新实践的挑战，塑造学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商业能力和新实践技巧。

(作者系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把高校性骚扰终结令落在实处

■李晨阳

这个12月注定不平静。先是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冯仁杰被曝以欺骗方式与多位女性同时保持性关系；紧接着，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钱逢胜长期骚扰并猥亵女生的消息又被曝光。

与前几年一些类似事件相比，此次北京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都在事件曝光后作出了迅速反应，涉事教授均已被辞退。

12月16日，教育部明确表态：对教师性骚扰学生等侵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零容忍”。同日，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将集中整治包括“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在内的不良行为，情节严重者将被依法依规撤销教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

这让人期待：高校性骚扰的终结令是否已经到来？

这让我思考：从“零容忍”到“零伤害”，高校要怎样把工作落到实处？

“师生恋”绮梦不再

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窗外》《穆斯林的葬礼》……无论现实还是文艺作品中，“师生恋”都有着并不小众的文化土壤。

这也让不少人在得知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禁止“师生恋”，甚至将“师生恋”定性为一项恶行时，大跌眼镜。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高校开始纷纷制定规则禁止“师生恋”。如果与直接授课的学生发生性关系，教师将受到严肃处理。在我国台湾地区，利用监护、教育、医疗等关系获得性交机会，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类似规定在欧美和港澳地区都并不罕见。但在中国内地，对“师生恋”的批判尚未形成共识。

具有一定学识和声望的教师，与容易好奇、擅于崇拜的年轻学生之间，不一定有“红颜知己”式的邂逅，但一定会存在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既包括年龄差距必然带来的人生阅历、社会地位、金钱资源等差距，也包括师生关系中特有的权力架构和身份定位。

而权力结构下产生的所谓“感情”，都很难彻底摆脱权力的烙印。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能会因为担忧对方的权力胁迫、崇拜对方的权力光环，甚至憧憬对方许诺的种种好处，而被动地



李晨阳

权力结构下产生的所谓“感情”，都很难彻底摆脱权力的烙印。

从制度上禁止教师与学生的感情关系和性行为，从文化和舆论上对所谓“师生恋”重新定性、严格正名，也就是从源头上治理高校师生之间的情感纠纷和两性乱象。

进入一段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弱势一方的个人意志难以得到充分尊重，也容易滋生长期的情感控制和情感剥削。

有调查显示，在权力关系解除后，很多当事人会为当初的投入感到后悔。

更严重的是，对“师生恋”的姑息，已经成了性骚扰等行为的遮羞布和挡箭牌。在北京大学冯仁杰的案例中，涉事教师就以恋爱甚至结婚等名义，骗取女学生的情感和身体。在另一些案例中，即便受害学生已经出现了抑郁甚至自杀等情况，侵犯者也会用“恋爱关系”“女生追求自己”等理由进行辩解。

因此，从制度上禁止教师与学生的感情关系和性行为，从文化和舆论上对所谓“师生恋”重新定性、严格正名，也就是从源头上治理高校师生之间的情感纠纷和两性乱象。

矫枉未必过正

教师帮扶学生，学生景仰老师——健康

的师生关系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有人担心，鼓励、支持、保障学生维权的过程，是否会影响正常的师生关系，甚至把教师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如果我出于好意关心和指导学生，却被学生诬告为‘性骚扰’，岂不是个人声誉和职业生涯尽毁？”一名教师表达的担忧颇具代表性。

学生诬告教师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具体到“性骚扰”等性暴力行为的指控上，恐怕概率并不会很大。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关于强暴的指控中，只有8%~9%是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而这8%~9%的案例也并非全是诬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调查方法不当导致的证据缺失。

鉴于中西方在性别理念和舆论环境中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些20多年前的数据对当下中国社会仍有借鉴意义——由于性侵害受害者在报案后更容易遭受舆论攻击等二次伤害，谎报和诬告性侵害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相比学生滥用权力甚至构陷教师这种可能性，更值得担忧的其实是受害学生不敢举报甚至求助无门。

2017年，广州性别中心根据6592份数据样本及上百案例发布了《中国高校大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不论男女生，在遭遇性骚扰后选择沉默忍耐的比例都接近半数。仅有2.7%的女生和1.6%的男生选择报告校方等管理部门；仅有1.2%的女生和0.5%的男生选择了报警。而举报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报告校方的受害者中，仅有23.7%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报警的受害者中，仅有19.2%感到满意。

广州性别中心的这篇报告自发布后也是争议不断，目前原文已难以查看。2018年12月，该中心因故停止运营。

这是校园性暴力事件最令人心痛之处：对学生伤害最深的，往往不是性侵害者造成的直接身体伤害，而是遭受侵害后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打破缄默后招致的舆论压力和社会歧视，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创伤。

把握“5年之机”

早在2018年，针对一批曝光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教育部就曾表示将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与此同时，国内数十所高校的学生和校友也发起了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倡议。倡议内

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当与新时代共同前进，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希望。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当培养珍惜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关心国家发展，关注国家大事，将个人成长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如何引导其成长，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研究青年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同时也是高校各方面工作的重要任务。作为青年教育的第二课堂，大学生理论社团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颁布之后，各高校都十分重视学生理论社团的建设与发展，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从学校到学院层面都有相应的理论社团；活动趋于多样化，现阶段理论社团的学习已不拘泥于传统的理论阅读，还增加了如辩论赛、演讲比赛、宣讲比赛等活动。

但由于一些问题，某些学生理论社团的发展受到了局限，比如成员素质参差不齐，入团目的不纯；社团缺乏指导，管理不够规范；活动缺乏生命力，难以吸引学生等。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信息化的发展，大学生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负面思潮的影响使得理论社团难以管理。

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确立会员的考核机制，确保会员有着一定的理论素质，纯净会员入会的动机；加强管理和引导，重视理论社团的发展；积极创新活动形式，拓宽活动平台，以吸引更多的学生一起学理论、共实践。这些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理论社团的活力。

然而，要切实解决学生理论社团的上述问题，除了这些措施以外，在理论社团自身建设方面，同样可以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使之成为既受学生欢迎，也能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的真正的第二课堂，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是认真筛选会员。在招新选择会员时，社团应当对候选人进行筛选，选取有理想、有信心、有能力的青年学生干部作为主要成员，选取关注国家、关心社会、有共同追求的青年作为会员。比如，北京理工大学共产主义学习实践会(以下简称“北理工共学会”)就采用了这种方式，由来自各院系热爱祖国、能力出众、思想素质过硬的学生干部组成，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性学生组织。

二是理论结合实践做调研。学生理论社团不仅是一个学习理论的社团，同样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实践，才能真正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北理工共学会就深入贯彻了这一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多次组织综合实践调研活动，形成一个让学生认识社会、自我锻炼的良好平台。

三是结合党课做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同样也是党的指导思想。学生党员的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阵地。学生理论社团可以通过和学校党课相结合，共同为培养合格党员、影响更多大学生作出努力。

以北理工共学会为例，它通过与学院党课相结合，积极参与到各个学院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党课中，与学院齐抓共管，共同组织学生党课，并带动周围同学共同提高政治觉悟、思想境界和思维能力，让更多的大学生关注国计民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是创新理论学习方式。学生理论社团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就是理论学习，但由于理论本身较为枯燥，如何拓展理论学习的方式方法，是每个理论社团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如何破题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仍以北理工共学会为例，它在学校“延安根、军魂魂”这一红色基因的基础上，贯彻了“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既有老师带领的文本学习，也有思辨式讨论、专家微讲座、社会观察沙龙、社会政策大演讲等丰富的活动，增强了社团成员的参与性、互动性，培养了其理论能力和思辨能力。

当然，在未来的工作中，学生理论社团还需要正确把握发展方向与路线，掌握恰当的发展思路，同时，还要把握好社团成员的思想倾向，避免走偏；需要加强组织内部的民主建设，改进社团组织结构，激发成员的能动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学生理论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需要加强骨干成员的组织管理能力培训，积极组织、参加骨干成员的组织管理能力培训，提高骨干综合实力，通过全方位的途径，辅助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着力形成“大思政”格局，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政治过硬的优秀人才。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学生理论社团该如何发展

■戴贝钰

(作者为本报记者)